

● 中国历史

会馆的社会影响初探^{*}

万江红¹, 涂上飙²

(1.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0; 2.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万江红(1966-), 女, 湖北红安人,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主要从事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涂上飙(1965-), 男, 湖北荆州人,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讲师, 法学博士生, 主要从事宪法的研究。

[摘 要] 作为异地同乡人活动的场所——会馆, 存在了 500 年, 其社会影响也是明显的, 它不仅汇聚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而且传播了宗教, 带来了人口的迁移等。

[关键词] 会馆; 社会影响; 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2-0173-05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 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而结成的民间社会组织。现知最早的会馆为明朝永乐年间芜湖人俞谟在北京建立的芜湖会馆^[1](第 13 页)。此后, 会馆的建立逐渐兴盛, 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 会馆发展到顶峰, 全国各地几乎无处不有会馆。“现今清国通商之市场, 会馆、公所, 莫不林立”^[2](第 90 页)。进入民国后, 会馆的发展虽因时代的变化而开始衰落, 但仍十分普遍的存在。有人曾把会馆形容为京城的一大奇观, “会馆充斥遍寰宇, 半为游民之栖止”^[3](第 35 页)。

会馆在当时全国的分布, 北方以京师为多, 据北京市 1949 年 11 月的统计数字为 391 所, 其中建于明代的 33 所, 清代的 341 所, 民国的 17 所^[4](第 4 页)。南方以长江流域的城市居多。重庆有 8 所会馆^[5](第 410 页), 沙市有 13 家会馆^[6](第 110 页), 宜昌有 7 所会馆^[2](第 631 页), 汉口有 25 所会馆, 芜湖有 17 个会馆^[2](第 633 页), 南京有 39 所会馆^[7](第 42 页), 苏州有 50 所会馆^[8](第 11 页), 上海 1930 年的统计数字为 62 所^[9](第 267 页)。当然会馆不仅仅局限于城市, 乡村也有不少, 现在的汉水流域上游不少地方都还有会馆遗址。四川的农村是会馆最多的省份, 人们多称它为移民会馆^[10](第 8 页)。

产生于社会之中的会馆组织, 对社会的影响十分广泛, 无论是对民俗文化、宗教还是民政、人口等都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一、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一) 对饮食起居的影响

不同地域的外乡人, 由于与本地生活习性的不同, 多以会馆为中心开展活动, 会馆成为日常生活的场所, 这样也就把不同的生活习性传给了所在地域。汉口民国时期的会馆在全国处于前列, 外地人也就特别的多, 时人这样记载: “此地从来无土著, 九分商贾一分民。”众多的外地人, 也就形成了饮食文化的“杂有吴越川广风”的驳杂局面。如“徽客爱缠红白线, 镇商喜捻旱烟筒, 西人不说楚人话, 三处从来习土

风”。西人指山西、陕西人,又叫“老西”或曰“跨子”,他们性嗜葱蒜,以致“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者识老西”。又他们雨天不穿钉鞋(木屐),齐脚跟的长袍必用“羊头”,所以时人称他们“高低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饮食方面,由于汇聚汉口的人口口味不同,各种地方风味饮食也就应运而生。如面粉业,汉口就有湖北帮、徽帮、湖南帮、小京帮和江浙、川陕等多种帮口。湖北帮、川帮、湖南帮面馆讲究原汤带红,其中湖南帮、川帮更喜用辣味;浙宁帮、徽帮、两广帮则以白汤(鸡、鸭、肉骨头汤)为主,而江苏帮喜用鱼汤;北方小京帮则注重干挑的。地方饮食汇聚汉口,大大丰富了武汉人的饮食习俗。北京的会馆位于全国首位,其饮食习俗也就丰富多彩。

言及饮食文化,有食必有饮。中国传统的饮包括饮茶和饮酒。很早中国人就有饮酒、饮茶的习惯,在会馆兴起后,这种饮习俗也得到传播和发展。北京由于有众多的会馆,而来自不同地方的酒也就在这里得到大聚会,久而久之各种不同的酒也就流传到市场。茶也是一样,会馆兴起后,饮茶习俗也就随商业及举人的步履开进了北京的会馆,每逢团拜、朔望、春秋两祭均是乡土茶文化的弘扬之时。

(二)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是人类借以表达情意、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组织生产和社会斗争的最重要的交流和思维工具。散聚各地的会馆,说的是本地的地方方言,其称呼叫法各异,“各省客民占籍,声意多从其本俗,同一意义至俗语,各处发音不同,如孙对于祖通称爷爷,祖母称婆婆,惟粤省人称阿公、阿婆。子对于父,楚省人称爹,粤省人称爸”。因此,会馆众多的地方就形成了一种语言的“双语”现象,即外来语和本地语共存。

会馆中“双语”现象的存在,为不同区域的人们保存了地方乡土文化的根,使之在文化融合中保存了自己区域独特的信息和文化内涵。会馆所创造出的文化氛围和传递信息的功能,使五千万海外华人身居异国他乡,传数代而不忘根本,均因在各地的华人会馆为其储存了血缘信息。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了会馆的社会性和民族性、融合性与存储性,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独创艺术,流传在世界华人部落之中经久不衰。同时,会馆中“双语”现象的存在,为语言改革做出了贡献。云集会馆的四方人,在进行交往时,往往是北方语、吴语、赣语、客家语、湘语、闽语、粤语等相互混杂。这种语言障碍给贸易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一种统一的语言需要就应运而生。随着北京成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北京地方方言为标准基础发展起来的语言,则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

(三)对艺术的影响

首先,众多的会馆为各地民歌以及戏曲的流传提供了条件,会馆是外乡人生活的场所,也是他们娱乐的地方。每当节日来临,他们都要举行盛大的文化娱乐活动,“自正月十五日始,至二、三月歌,银花似树,舞榭歌台;鱼龙漫衍之观,蹋鞭之枝,摩不毕具,夜尚演戏,价廉工省,而人乐从,通宵聚欢,至晓方散”。到了下半年,也有类似的活动,“自八月起至十月下旬止,……各街骑街搭台,演唱秋极之戏,每日必有酒席”。会馆里进行的众多文娱活动,不少都对该地方产生了影响,如四川灯会期间所唱的《采茶歌》与广东潮州灯节所唱的《采茶歌》十分相似。四川的《采茶歌》是这样的:“二月采茶茶叶青,茶叶树下等莺莺;三月采茶茶花开,借问情依几时来?……。”有趣的是,广东潮州的《采茶歌》与之极为相似:“二月采茶茶发青,姐妹双双去采茶,大姐采多妹采少,不论多少早还家;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绣手巾,两头绣出茶花朵,中间绣出采茶人。”这里虽然无法确论四川的茶歌来源于广东,但可以推知广东对四川的影响。因为广东在四川的众多会馆里,举办娱乐活动,唱茶歌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戏曲作为中国传统的艺术在会馆里也得到传播。北京的不同会馆里,各种戏剧竞相开场,河南会馆唱豫剧,安徽会馆唱黄梅戏,湖北会馆唱汉剧,广东会馆唱粤剧,使京师处处回响着阳腔、梆子腔、西皮调、二黄调,百花齐放,各显神韵,在北京会馆之间形成地方戏剧交流、融合的空间。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窥见一斑,“民国时,会馆戏楼全部对外开放,湖广会馆、江西会馆戏楼是北京南城最为热闹之所在。江西会馆除名伶演出之处,俞平伯、吴梅、袁寒云等票友亦登台献技,表演几出昆曲,以助雅兴。辫帅张勋入京复辟,江西会馆整日鼓锣喧天,车水马龙,搅得宣外大街,一时也不能安宁”^[11](第 55 页)。

其次,绵存 500 多年的会馆也是对祖国建筑艺术的一种贡献。会馆建筑群非一般官邸所能比,北京

的湖广会馆因殿堂、戏楼华贵,沈德符在《野花编》中盛赞“壮丽不减王公”^[11](第29页)。北京的安徽会馆有左中右3路大套院组成,各路套院又由5个四合院组成,共有房屋数百间。套院中建有“文聚楼”、“神楼”、“思敬堂”、“藤闲吟屋”、“戏楼”、“看楼”等建筑^[11](第29页)。会馆除规模庞大外,其建筑布置也十分别致。安徽会馆的“戏数”小巧玲珑,三面由看楼环绕,高雅、清丽,每至余音绕梁,使人颇感韵味。馆内另辟有花园,古木参天,花木繁盛,竹荫翠绿,别有风光,常常使宾客留连忘返。文州会馆更具有独特之处,犹如私宅别墅的雅园。广州会馆原为浙江人文学家李渔的府邸,由34间房和15间游廊组成,结构精巧、环境优雅,被李渔定名为《芥子园》。

总之,会馆建筑艺术、园林艺术荟萃了天下精华,融会了不同地域的风格,形象各异,千姿百态,为丰富祖国的建筑艺术做出了贡献。

二、对社会宗教的影响

宗教作为人们长期以来的一种精神寄托,在会馆里也得到传播和发展。

首先是祭祖敬贤在各会馆里的传播。为敦睦乡谊、加强团结、宣传乡土主义,各会馆里都有祭祖敬贤的传统,每至朔望之日,同乡均要至会馆乡贤祠、敬贤堂,向所供乡贤神龛烧香致敬,先由会馆董事预备牲醴致祭,而后同乡拜祭。礼毕后,即于殿前举行团拜会,行三揖礼,以联络乡谊。因地方不同,各会馆里都供奉不同的乡贤,如在北京,广东会馆乡贤祠供奉的是明代忠臣袁崇焕,江西会馆乡贤祠供奉的是宋代忠臣谢枋得,四川会馆乡贤祠供奉的是明将秦良玉,河南会馆供奉的是宋朝名将岳飞,山西会馆供奉的是明朝忠臣张铨、高邦佑、何廷槐,福建会馆供奉的是清代名臣王可庄,云南会馆供奉的是明朝名臣赵溪,山东会馆供奉的是唐朝名臣秦叔宝,安徽会馆供奉的是宋代思想家朱熹。

其次是崇“圣”活动在会馆里的传播。敬贤祭祀活动增进了会馆同乡之间的友谊,但并未能在精神上给予崇拜者以安慰,于是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超自然力的圣明君主来主宰人们的行为及精神寄托。因此,文拜孔子、武拜关公的会馆祭祀活动首先在山东会馆和山西会馆内同时兴起。由于孔子、关公是被封建统治者隆祭和肯定的人物,很快许多会馆里就供奉起孔子、关公来。

再次是崇“仙”活动在会馆十分活跃。崇“仙”也是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一些会馆在崇尚超自然的圣明君主的同时,也有一些会馆崇尚神灵之物,如崇尚许真、天妃、大禹等。许真即许逊,东晋道士,传说东晋宁康二年在南昌西山全家42口拔宅飞升,宋代封他为“神功妙济真君”。天妃又称林妃,福建莆田人,五代闽王都巡托林愿之第六女,生时有祥光异香。她通悟秘法,预知林咎,乡民以病告辄愈。死后历朝受封,初为灵惠夫人,后封为“天妃”。

会馆里的这些宗教活动,使各地的文化得到传播,在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中得到发展。如山东会馆里崇拜孔子,通过传播使更多的人对齐鲁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商业会馆里的宗教活动,则成为中华民族商业文化中一大奇特现象,并由中国推广到全世界华裔所在地。

三、对社会的其它影响

(一)对社会民政的影响

会馆作为一种社会民间组织,由于它的功能所在,自觉不自觉地履行了一些社会民政的功能。会馆是为了帮助客居异地的同乡维护同乡人的利益而设立的,这一点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慈善公益色彩。因此,它做了许多慈善的、公益的活动,如联络乡情、为同乡服务,包括对死者的施棺、义埋、运柩回乡,对生者的施诊、施药等各种救济资助,以及为教育后代而举办义学等。

1. 对死者的服务。对死者服务在会馆中尤其受到重视,很多会馆的起源和最初举办的事务便是这些。上海的宁波会馆,对会馆的事业明白规定:本会馆“以建丙舍,置义冢,归旅亲,设医院等诸善举为宗

旨”^[12](第 303 页)。由于中国人对“死”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入土为安和归葬故里,因此会馆为此举办的事务主要有施棺、寄柩、设义冢和运柩回乡,以运柩回乡为最终目的。施棺是为死后无力购买棺木的同乡准备的。“寄柩就是死在外地的人,一时无法运送回去,就放在会馆所建的殓舍里,作为临时停放点。义冢是死后无钱回乡的人,由会馆埋葬在自己的义地里。运柩回乡是会馆对死者服务的最终目的,一般是每年规定一个时间集中运柩回乡,水路、陆路运送看具体方便而定。上海的宁波会馆,1933 年设置丙舍保管的棺木共 3 435 具,运回故乡 3 824 具,又殓材 530 具”^[12](第 304 页)。

2. 对生者的服务。会馆对生者的服务,主要是举办了大量的慈善公益事业,如医疗服务和济贫义捐。民国是无所谓公共医疗制度的,而生病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一般的会馆都尽可能地设置施针、施药的事务,或设立诊所,有力量的会馆甚至开办自己的医院。如上海的宁波会馆,1906 年开始设医院,很简陋,“后投以八万元的巨资得建一巨大的院所,……民国 22 年(1933 年)时,入院病人计 1 951 人,而门诊达 60 343 人之多”^[12](第 304 页)。济贫义捐是指同乡之中初到异地,人生地疏,或因失业常常面临生活的困窘,在谋得新职业之前是需要救济的,会馆就担当起了这一责任。随着时代发展,会馆的这一济贫义务并不局限于同乡之中,而是扩大到社会之中,形成义捐活动。1931 年汉口发生了大水灾,汉口的太平会馆、长沙会馆都分别开设了收容所,进行赈济活动。除此之外,会馆还开展养老、育幼、接济、介绍职业等活动,上海的宁波会馆就设有四明孤儿院,收养孤寡老人。

以上会馆所从事的一些活动,虽有局限于同乡的局限性,但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所从事的各项公益活动,是对当时不足的国民政府民政的一种贡献。1947 年国民政府社会部编的《社会福利统计》记载,1947 年总共救济 8 525 618 人,其中政府救济 2 695 842 人,包括会馆在内的慈善机关救济的有 5 643 153 人,宗教团体救济 186 623 人^[13](第 659—660 页)。同时,会馆所从事的这些活动,也弥补了中国社会组织不甚发达的缺陷。为解决同乡人的困难而举办的各种慈善公益事业,从局部讲,它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民众问题。

(二)对社会人口的影响

会馆是一种异乡人的居住活动场所,因此有会馆存在的地方就有一个人口流动问题。一般来说,会馆多的地方,该地的外来人口也就比较多。民国汉口的会馆公所计有 200 多所,外来人口也就特别的多。《汉口丛谈》中说:“瓦星竹楼 4 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亦云:“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星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上海亦是会馆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工商行业会馆,因此上海外来人口也特别的多。上海“同治间,人口共 50 余万。三、四十年来,侨寓日多,孳生日众。近年(民国 16 年前后)各省兵事,来沪者益多,居民号称百万,殆又过之。户口之众,超过于京、津、汉三埠,人烟稠密,几有人满之患,惟本邑人数之多,实由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良莠自不能齐”^[14](第 302 页)。

以会馆为基地的人口流动,无疑会对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影响。前面说的会馆的众多影响就是其中的一些方面,除此之外,人口的流动对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城市发展规模都会产生影响。现以汉口为例,民国汉口众多的会馆,必然会导致外来人口的增加,这一增加主要是体现在工商人口的增加。1861 年以前,汉口共有 9 万多人,市区局限在汉正街、黄陂街一带,商店充其量不过一二千家。到 1911 年时,汉口商店达 7 000 多家。到 1920 年时,已达 2 万多家。与之相关的工厂、银行、轮船公司和铁路系统的经营者和员工亦相应增加。工商业者、店员、产业工人、苦力、手工业者及其家属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1915 年的《汉口小志》提供的数据,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出汉口人口的职业分布:军、政、警、法界 652 人,学、报、绅界 2 351 人,商界 30 990 人,律师、馆幕、司事类 652 人,矿工、儒士、美术、地理、星卜 1 513 人,术士、教干 148 人,小艺 4 625 人,水手、划工 1 803 人,车夫、轿夫、码头夫 10 742 人,医士 401 人,种植、畜牧 761 人,挑水人、佣工、使役、厨役 13 779 人,金工、木工、石工 5 692 人,道士、僧侣 415 人,苦力 3 671 人,废疾 98 人,船业 251 人,洋伙 749 人,渔业 588 人,乞丐 494 人,公差 487 人,优伶 109 人,无业 4 579 人。从上可看出汉口城区的职业分布更集中在商业、手工业、水陆码头工、佣工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尤以外来人口的比例为大,如汉口的湖南宝庆会馆,以经营码头为主,其人员到 1937 年达到 4.5 万之多。当

时新化县城也只有 3 万人口,宝庆码头人口超出新化县城,地盘也比新化县城大。

以会馆为活动基地的外来人口的增加,也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如上海、汉口,在民国时期都是外来人口特别多的地方,外来人口的增多,不仅使上海、汉口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大都市,而且使这两城市的商业功能大大加强,具有城市空间以商业社区为主体、街市密集、巷里密集、商店密集、人口密集的特质。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汉口的江汉路、中山大道,都是这一商业功能的具体写照。当然外来人口的集增,也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外来人口纷纷涌向城市,造成异地人口在狭小的空间高密集结。为了找到各自的生存空间,他们抢占势力范围,分块割据,为达到目的与各种黑势力勾结,因此殴打、械斗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湖南与汉口木商为争夺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湖南宝庆府商人和徽商为争夺汉口宝庆码头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争执。时人记载“码头大小各分班,划界分疆不放宽”,“横冲直撞途人避,第一难行大码头”。

参 考 文 献

- [1]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 [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66.
- [2] 彭泽益.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 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 下篇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 [4] 胡春焕, 白鹤群. 北京的会馆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 [5] 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 [6] 毛鸣峰. 旧社会沙市的行帮组织与工商关系. 湖北文史资料 [Z]. 武汉: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出版, 1987, (3).
- [7] 吕作燮. 南京会馆小志 [J]. 南京史志, 1984, (5).
- [8] 吕作燮. 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4, (2).
- [9] 洪泽. 通往世界之桥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 [10] 刘正刚. 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 [J]. 清史研究, 1999, (4).
- [11] 汤锦程. 北京的会馆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4.
- [12] 上海通志社编. 上海研究资料 (续集)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4.
- [13] 金双秋. 中国民政史 [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 1989.
- [14] 黄苇, 夏林根. 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责任编辑 张琳 吴有法)

On Social Influence of Guilds

WAN Jiang-hong¹, TU Shang-biao²

(1. Sociology Department, Hua 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WAN Jiang-hong (1966-), female, Lecturer, Sociology Department, Hua 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strength; TU Shang-biao (1965-), male, Lecturer, Graduate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stitutions.

Abstract The guilds as the place where people coming from the same hometown active has existed 500 years. The social influence is apparent. It not only brings the colorful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he religion and brings th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guilds; social influence; folk culture